诗歌史的早期建构及其学术史价值

钱 志 熙

(北京大学 中文系, 北京 100871)

摘　要: 中国诗歌史的古代时期建构,是现代形态古代诗歌史研究的重要基础。从远古到两汉时期的诗歌史建构,属于中国古代诗歌史建构的早期形态。诗史建构渊源久远,最初主要是依附于乐史的整体之中,“先王之乐”构成其基本的观念。孟子“王者之迹熄而诗亡”可视为最早的诗歌史阐述。儒家主要以《诗经》为主体建构诗歌史,但在理论上也扩展到整体诗歌史之中。汉代史家司马迁、班固等人,援引儒家乐教、诗教的观念建构楚辞、乐府诗歌的诗歌史,并且在诗骚、诗赋之间寻找关系,使诗歌史的建构趋向于全面。但是,班固等人在建构诗歌史时,仍然有经典与非经典的观念横亘其间,使真正意义上的整体诗歌史建构难以完全达成。

关键词: 诗歌史建构;汉代诗学;汉儒;汉代史家

中图分类号: I 207. 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919(2019)01-0103-10

中国古代诗歌史古代时期的建构,是现代形态古代诗歌史研究的重要基础。所谓现代的诗歌史建构,是指近现代引进西方的文学观念尤其是关于诗歌及诗歌史的观念以后的中国古代诗歌史建构。事实上它的许多基本史料与观点,是取资于古代时期的建构成果的。但古代时期诗歌史研究的整体及统系,也因此而被相当程度地淹没和遮蔽了。所以有重新呈现的必要。

我认为古代时期的诗歌史建构大体可分为两大段,一段是从远古到两汉时期的诗歌史的早期建构,这个时期文人诗歌的创作传统尚未确立,诗歌史建构主要是依附于乐学、经学及史学等学术形态中,从某种角度来说是一种与现代学术有所接近的客观性研究的特点。另一段则是魏晋以降文人诗创作传统确立之后,随着文人诗系统的发展而逐渐形成的诗歌史建构。这一段的诗歌史建构,除了前期如钟、刘等人的诗歌史叙述采用较为客观的学术研究的形态外,后来的主体是与同期诗歌创作的问题紧密联系的一种作家建构的诗歌史。即拿钟、刘两家、甚至如南朝至唐初的正史“文苑传”来讲,虽呈现为客观形态的诗歌史叙述,其实也都是着眼当时的诗歌创作问题的。所以我们说这种专门著述形式的诗歌史,仍属于文人诗歌史建构的范畴。

本文的论题,主要集中在中国古代诗歌史的早期建构方面,希望尽量完整地呈现早期诗歌史建构的整体面貌,厘清早期诗歌史建构所依存的多种学术形态,寻找中国古代关于诗歌及诗歌史的一些重要观念与观点发生与发展的历史事实。如果能够为现代的诗歌史建构提供某种对比,并有助于勘清现代诗歌史建构对早期诗歌史建构的继承与变异,则未始不是一种学术上的基础工作。

一

有关诗歌的史的意识究竟发生于何时? 恐怕是一个难以回答的起源论问题。某种意义上说,与追问诗歌的起源一样复杂。同时,诗歌史又不等同一般的诗歌理论。它应该是比一般的诗歌理论与诗歌艺术意识更为后起的一种属于意识与理论形态的东西。我们知道,中国古代最早的成体系的诗歌理论是《尚书·尧典》的“诗言志”说,但在那里面却看不到任何对于“诗”的史的认识。

收稿日期: 2018-07-27

作者简介: 钱志熙,男,浙江乐清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当然,我们不能因此就说那个时代完全缺乏对诗歌的史的知识与意识。因为当一种文化事物有相当的积累与时间经历后,自然就会发生一种史的知识与意识。但是我们所要寻找的是一种呈现为观点或称理论的形态的“诗歌史”知识。同样,在周代兴盛的诗教、即太师教诗的活动中,对诗的历史知识的传授,也应该是其中的一部分。《周礼·春官大宗伯》与《礼记·乐记》主要是记载了乐教时代音乐及歌诗制度与事实,《乐记》更是对包括诗歌在内的“乐”生于人心之感物而发的发生原理做了探讨。这些文献中虽然没有系统的乐史与诗史的建构,但也提到像“先王作乐”这样的重要观念,如《礼记·乐记》:“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夔始制乐,以赏诸侯。”①又如其记载尧、黄帝、舜、禹及殷周历代的乐章及意义:“《大章》,章之也。咸池,备矣!《韶》,继也。《夏》,大也。殷周之乐尽矣!”②并有“五帝殊时,不相沿乐”的对于历代音乐的发展的看法。③ 这些思想,尤其是“先王作乐”这样观念,与圣人作诗一样,代表了古代儒家对于乐章起因的看法,奠定了后来诗歌史建构中以王道教化为基本价值的评价标准。

正如早期诗论多寄寓于乐论之中,早期带有萌芽性质的诗史叙述也是寄寓于乐史之中的。《吕氏春秋·仲夏纪》不但是早期最具系统的乐论著作,同时是也最早的乐史。其中《大乐》开篇即云:“音乐之所由来者远矣”④,《古乐》篇更具体地说:“乐之由来者尚矣也,必不可废,有节有侈,有正有淫矣”⑤,提出了判断乐史的基本标准,并且历叙自上古朱襄氏至周公的历代之乐,实为后世音乐史、诗歌史追溯源头理论的首倡。不仅如此,《古乐》中《音初》一篇还系统地追溯了四方音即四方歌曲的起源,其建构乐史的意识极为明确。其基本的观点是这样的:夏后氏孔甲的《破斧之歌》“实始为东音”。⑥ 夏禹妻涂山氏女之妾之《候人兮猗》之歌“实始作南音”。⑦并且,作者认为《周南》《召南》正是从它发展出来的。至护卫周昭王南征有功的辛余靡长封侯于西翟,取殷人思故处之歌以传播于西山。作者认为这是“实始作为西音”者。后来“秦缪公取风焉,实始作为秦音”,亦即十五国风中的《秦风》。⑧ 北音之始,则为有娀氏二佚女所作的《燕燕之歌》。在这一篇追溯四方音之始的文章中,作者原始要终,分别为《诗经》中的二南及秦风寻找到渊源。其事实虽若不可考证,但作为一种诗歌史建构的意图是很明确的。我们不能不说这是最早的系统建构诗歌史的文本。不仅如此,《吕氏春秋·仲夏篇》各篇用侈乐、古乐、适音等观念来评衡古今的的各种音乐,虽然基本的性质在于建立一种理想的音乐,但事实上也是建构音乐史必不可的价值标准。它们与《乐记》的“先王之乐”等概念一样,同样也是诗歌史的价值标准。

“先王之乐”以及王者制礼作乐等观念,也是儒家对于音乐与诗歌的基本史观。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崇礼乐,诵诗书,《论语·述而》记载:“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⑨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认为:“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⑩孔子因此而“正乐”:

> 孔子语鲁大师:“乐其可知也。始作翕如,纵之纯如,皦如,绎如也,以成。”“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⑪

孔子又删诗三千余篇为三百篇:

> 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

①② 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下册,卷三十八,北京:中华书局 1980 年版,第 1534 页。
③ 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卷三十八,第 1530 页。
④ 高诱注:《吕氏春秋》卷五,《诸子集成》第 6 册,上海:上海书店 1986 年版,第 46 页。
⑤ 高诱注:《吕氏春秋》卷五,《诸子集成》第 6 册,第 51 页。
⑥⑦ 高诱注:《吕氏春秋》卷五,《诸子集成》第 6 册,第 58 页。
⑧ 高诱注:《吕氏春秋》卷五,《诸子集成》第 6 册,第 59 页。
⑨ 刘宝楠撰、高流水点校:《论语正义》卷八,北京:中华书局 1990 年版,第 269 页。
⑩ 司马迁:《史记》第 6 册,卷四十七,北京:中华书局 1959 年版,第 1935 页。
⑪ 司马迁:《史记》第 6 册,卷四十七,第 1936 页。

> 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故曰“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①

司马迁认为孔子是周代诗教与诗学的继承者,并且是《诗经》的整理者。他的删诗说,成为《诗经》学中的一个聚讼纷纭的问题。清代诗经学家陈乔枞等人认为司马迁是属于鲁诗派学者。他关于“始于衽席”的看法以及《关雎》为周衰之诗,也是属于鲁诗的观点。四始之说,很可能也是鲁诗派的说法。但无论如何,我们看到这样一个事实,司马迁作为一个史家,不同于一般的学者,他叙述的原则是要体现事实的完整性。同时,他所叙述的孔子的删诗行为,包含了文献编纂与经典选择的意义,同时从他的叙述中,也可以看出孔子对于诗的历史的认识,虽然这个认识是一种伦理原则即“礼义”为基本的裁断标准的,但它无疑也是一种诗歌史的建构。即孔子的整理诗三百篇,实质上应该是一种诗史的建构。这种诗史建构,无疑是汉儒评价《诗经》的各部分及各个具体作品的标准。

二

儒家本着先王之乐、王者制礼作乐等观念,提出了“王者之迹熄而诗亡”的看法,可以说这是我国古代第一个明确的诗歌史观点。《孟子·离娄章句下》:

>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②

关于“诗亡然后《春秋》作”,竹添光宏《左传会笺·总论》引钱锜之论云:

>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朱子因国风,终于陈灵,在鲁宣公时,鲁颂亦皆僖公时所作,故释诗亡为雅亡。夫(风)与颂不得谓之非诗。且孟子何不直云雅亡,而泛言诗亡乎。今就本文思之,东迁之初,政教号令虽不行,而王者之泽尚存。是非美刺犹在人心。迨后百年,王泽无复存矣。故王者之迹熄。王泽既不存,则人心之好恶亦不正,而是非美刺之诗绝不复闻。故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孔子生于鲁襄公二十一年,去诗之亡已数十年。及周游列国,道不能行,退而终老,去诗亡又数十年。乃作春秋,记善恶,存褒贬,以代诗之是非美刺。故曰诗亡然后春秋作。如此则诗亡之义显。而作春秋之大义,亦昭然可见矣!③

钱氏这里是把“王者之迹熄而诗亡”作为早期诗史中的一个重要事实来考述。而“诗亡然后《春秋》作”,并不局限于诗歌史内部,而跨越到另一制作领域。由《诗》到《春秋》,它们之间的联系,并非同文体内部的继承,而是孔子取诗之是非美刺之义而作《春秋》。这应该是接近孟子的原意的。联系到后来班固《汉书·艺文志·诗赋略》所说的“学诗之士逸在布衣而贤人失志之赋作”的观点,可知早期建构的诗史并不局限于诗歌文体界囿内,而是突破了诗歌内部,在《春秋》及赋中寻找其继续发展的脉络。这样一种带有大文学史特点的诗史建构及其所包含的事实,迄今都未得到有效的阐述。无论是《诗》亡然后《春秋》作,还是“学诗之士逸在布衣而贤人失志之赋作”,都是侧重于意义之传承与递嬗,而忽略了体制与形式的隔阂。不同文体、不同述作之间,是可以有这种跨越体制与形式隔阂的意义与方法之传承。这是文学史发展的规律之一。而中国古代在大文学观乃至在文化的整体中建构文学史、诗史的传统,可以说在早期的乐史、诗史的建构中就已显示其端倪。孟子所说的“诗亡”,班固所说学诗之士逸在布衣,如果属于事实,应该在诗歌史的叙述中有所呈现。

以王道之盛衰为诗道之盛衰的诗史建构方式,在《毛诗·大序》里发展为风雅正变之说。《毛诗·大序》先是正面地阐述“先王以是经夫妇、成

---

① 司马迁:《史记》第 6 册,卷四十七,第 1937 页。

② 焦循撰、沈文倬点校:《孟子正义》卷十六,北京:中华书局 1987 年版,第 572 页。

③ 竹添光宏:《左传会笺》第 1 册,台北:广文书局版,第 7 页。

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王道诗学,①用来解释风、雅、颂的发生机制及作用。然后根据这同一原则,解释变风、变雅产生的原因:

> 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 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风其上,达于事变而怀其旧俗者也。②

班固《汉书·礼乐志》继续发挥这一观点:

> 周道始缺,怨刺之诗起。王泽既竭,而诗不能作。王官失业,雅颂相错,孔子论而定之,故曰:“吾自卫返鲁,雅颂各得其所。”③

根据孟子的说法,孔子生存于诗亡之世。他继承王官诗学的工作,一是作《春秋》,寻求在另一种著述中传承诗学是非美刺的功能;一是正乐,并编纂“诗三百”的文本。前述司马迁有孔子删诗之说。班固似乎没正面的接受删诗之说,而退回到《论语》中孔子的自述。然而就孔子所作的这两件事情来看,他应该对王道诗学的变化之迹已经有所论定。后儒如孟子、汉代诸家,正是踵承孔门之说而建构以王道为核心义理的风雅正变的诗歌史。

郑玄的《诗谱序》,是他为《诗经》所做的一个史谱,可以说是孔、孟至汉儒诸家诗歌史学之集大成。在这里,他第一次提出了诗歌的起源问题:

> 诗之兴也,谅不于上皇之世? 大庭、轩辕,逮于高辛,其时有亡,载籍亦蔑云焉。《虞书》“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然则诗之道,放于此乎?④

《尚书·尧典》确立了“诗言志”之说,《毛诗·大序》又加以“在心为志,发言为诗”的解说,并且加上“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这不仅是一种诗歌本体论,同时也是一种诗歌发生说。郑玄“诗之兴,谅不于上皇之世”,正是依据这一发生原理做出的推想,在其中当然也包含了圣人作诗的思想。重要的不是结论本身,而是第一次提出了诗歌史起点的问题,从这里可以看出汉儒将“诗”作为独立的创造事物的发生、发展历史的正面把握的意图。而他根据《虞书》之说,具体地确定诗道发端于虞舜之世,则体现了汉儒实事求是的学术精神。其后他叙述了夏、商、周三代的诗歌历史,完全是依据《诗经》作品的:

> 有夏承之,篇章泯弃,靡有孑遗。⑤

按夏代诗歌之存者,如《吕氏春秋·音初》所载涂山氏之歌,夏后孔甲破斧之歌。以及屈原《离骚》所说“启九辩与九歌兮”,皆是。而郑氏不举。可见其对于诗的范围,是局于风雅颂的,没有将其扩大到杂曲歌谣方面。虽然他在叙述诗歌发生时,具备了整体的诗歌史观,但在具体的诗歌史叙述中,又局囿在经典的视野中。这与班固的诗歌史建构分裂为经典与非经典两部分一样,反映了汉儒诗史观上的一种局囿。有关商代的诗歌,他也只注意到商颂:

> 迩及商王,不风不雅。何者? 论功颂德,所以将顺其美;刺过讥失,所以匡救其恶。各为其党,则为法者彰显,为戒者著明。⑥

这是解释商代只有颂的原因。大概是颂只有美,而风、雅则美刺兼具。一在劝,即将顺其美,一在于谏,刺过讥失。他们目的是一样。商专颂美,而不为刺讥,其道亦足。

> 周自后稷播种百谷,黎民阻饥,兹时乃粒,自传于此名也。陶唐之末中叶,公刘亦世修其业,以明民共财。至大王、王季,克堪顾天。文武之德,光熙前绪,以集大命于厥身。遂为天子父母,使民有政有居。其时诗,风有《周南》《召南》、雅有《文王》《鹿鸣》之属,及成王、周公致太平。制礼作乐,而颂声兴焉。盛之至也。本之由此风雅而来,故皆录之,谓之诗之正经。⑦

这是论述文王、武王时期的诗歌,认为“国风”中的《周南》《召南》及《大雅》中的《文王》《鹿鸣》等是这个时期的诗歌。它们同时也是文王制礼作乐

---

① 孔颖达:《毛诗正义》卷一,《十三经注疏》上册,北京:中华书局 1979 年版,第 270 页。
② 孔颖达:《毛诗正义》卷一,《十三经注疏》上册,第 271 页。
③ 班固:《汉书》第 4 册,卷二十二,北京:中华书局 1962 年版,第 1042 页。
④⑤⑥⑦ 郑玄:《诗谱序》,孔颖达:《毛诗正义》卷首,《十三经注疏》上册,第 262 页。

的主要成果。这应该是周诗的最核心的部分,也是儒家构建的诗歌史的核心。称它们是“正经”,应该是汉儒的说法。“大序”有变风、变雅之说。它们是风雅之变。所以后来又有正风、正雅之说,也就是郑玄所说的“正经”。

> 后王稍更陵迟,懿王始受谮亨齐哀公,夷身失礼之后,邶不尊贤。自是而下,厉也,幽也,政教犹衰,周室大坏。《十月之交》《民劳》《板》《荡》,勃尔俱作,众国纷然,刺怨相寻。五霸之末,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善者谁赏,恶者谁罚,纪纲绝矣!故孔子录懿王、夷王时诗,及陈灵公淫乱之事,谓之变风雅。以为勤民恤功,昭事上帝,则受颂声,弘福如彼;若违而弗用,则被劫杀,大祸如此。吉凶之所由,忧娱之渐萌,昭昭在斯,足作后王之鉴,于是止矣。①

这一段是叙述周衰至春秋时期的变风变雅之作。与《毛诗·大序》中叙述变风变雅的一段文字意思相近。但郑玄叙述得更具体,而《大序》是概括叙述。主要的内容,也是概括于《毛诗》的各篇小序。总结郑玄的诗史的基本观点,诗兴于上皇之世,然大庭、轩辕不见于载籍,现在可以考见的诗道之始在《虞书》“诗言志”之说。自后夏诗不存,商仅颂,至周代方才有完整的风、雅、颂,而因王道之盛衰,又由正风、正雅而演为变风、变雅。最后一个观点,据郑玄所说,是来自孔子。也就是郑玄《诗谱序》,是对从孔子到汉儒诸家的诗史的一个集成。

郑玄的这个诗歌史叙述体系及方法,对后来的诗歌史及一般的文学史叙述,影响很大。这里最重要的一点是,郑玄第一次对《诗经》史做了系统的叙述,他同时还追溯到诗歌的起源,延伸到普遍的诗歌史的领域。古代对诗歌起源的追溯,多是引用郑玄此说,少有发展。其实《吕氏春秋》已经追溯诗歌的起源,有四方音之始的说法。但由于《吕氏春秋》主要是着重于“歌”与“乐”这样的概念,与“诗”这个概念有距离,所以他的起源说影响不大。事实上,中国古代关于诗歌起源的问题,基本上停止在这样的结论上,一直到近代西方的诗歌起源论引进来之后,才有进一步的探讨。

三

诗歌史的早期建构,进入汉代后开始以一种自觉、独立的史学意识出现。这一成就,是与汉代史学的发达直接联系在一起的。司马迁《史记》从历史的角度叙述孔子在《诗经》整理与研究方面的成就,又以人物传记的方式叙述屈原的创作,开后世文苑传之先例。班固则从文化史与文献学的角度,对《诗经》、《楚辞》、汉赋、乐府歌诗做了叙述。两家先后相继,奠定了局部的诗歌史。史家本着“实事求是”,并且还有“通古今之变”的自觉的历史意识,初步建立了诗歌史的脉络。经学家郑玄的诗论,融合史家与经学两方面的成果,作《诗谱》并序,第一次建构历时的《诗经》内部的诗歌史,由《诗经》诗歌史的局部推及整体诗歌史。王逸的《楚辞章句》并序,也是采用历史考证、实事求是的方法来评论屈原作品,比较多地吸收了《毛诗·大序》的变风、变雅理论,充分地肯定了楚辞作品突出的个体抒情特点。在诗歌抒情理论的方面做出重要的发展。对后世的影响也是十分深远的。

与司马迁相比,班固的诗学思想趋向于保守。但作为史家,他对诗赋源流的探讨,以及对诗歌文献的整理,贡献是相当大的。班固依刘向、刘歆的《七略》作《艺文志》。班固《汉书》的《礼乐志》及《艺文志·诗赋略》是有关于先秦至汉代的诗歌史及诗乐关系最重要的文献。前者在我们今天的学术分野里,属于文化史的范围;后者则属于文献目录学的范围。这样,我们也可以说,班固的诗论是从文化史与文献目录学的中引发出来的。这再次告诉我们,中国古代的诗歌理论与批评,是从多种学术体制中产生的。我们说,歌谣古诗及《诗经》、乐府、楚辞,它们都是一些固定的东西,但在早期的诗学发展中,它们是被放在不同的学术与文化的体制中被关注的。其中唯一缺乏的,恰是立足诗歌自身立场的诗歌创作与批评的体制。如果从诗歌本身的立场来说,《诗经》、楚辞、乐府歌辞,当然应该放在一个整体中论述。所以,班固的诗论中,横亘着经典与非经典这样一对重要概念。

---

① 郑玄:《诗谱序》,孔颖达:《毛诗正义》卷首,《十三经注疏》上册,第 263 页。

他对《诗经》的阐述,是一种经典论。他对楚辞与乐府的阐述,才是一种正常的诗歌批评与诗歌史研究。

班固对于诗歌史的史料,采取两种著录的方式。对作为儒家经典之一种的《诗经》,他放在《艺文志·经·诗》部里。《汉书·艺文志》六艺部分对《诗》类文献有一个总按:

> 《书》曰:“诗言志,歌咏言。”故哀乐之心感,而歌咏之声发。诵其言谓之诗,咏其声谓之歌。故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孔子纯取周诗,上采殷,下取鲁,凡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讽诵,不独在竹帛故也。汉兴,鲁申公为《诗》训故,而齐辕固、燕韩生皆为之传。或取《春秋》,采杂说,咸非其本义。与不得已,鲁最为近之。三家皆列于学官。又有毛公之学,自谓子夏所传,而河间献王好之,未得立。①

又《汉书·食货志》:

> 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大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故曰王者不窥户牖而知天下。②

与司马迁删诗说相对,班固叙述了在汉儒中影响很大的“采诗”说,此说应该也是战国至汉代流行的说法。《礼记·王制》有“天子五年一巡守……命太师陈诗以观民风”③,《孔丛子》亦记载古者天子巡狩:“命史采诗谣,以观民风”。④ 何休《公羊传》“宣公十五年”解诂:“男女有所怨恨,相从而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男年六十,女年五十无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间求诗。乡移于邑,邑移于国,国以闻于天子。故王者不出牖户,尽知天下所苦,不下堂而知四方。”⑤

采诗之说在诗歌史建构上的一个重要的意义,就是诗出于歌谣之说,并且包含着诗为民间之作,诗之本体在于歌谣这样的诗歌思想。值得注意的是,这在《毛诗》体系中并不突出。关于《诗经》,尤其是其中的风诗的发生,就有圣贤作诗,与风诗出于歌谣的不同说法。汉人因为熟稔于汉代乐府出于歌谣这个事实,所以普遍地接受采诗的说法。这是诗歌史的建构与当代诗歌实践相呼应的一个例子。因为采诗观风的说法,也强调诗歌创作出于人们自然讴吟的事实,于是有何休的有所怨恨而作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之说。这都是直接可以在《诗经》的作品中得到印证的,是汉儒在《诗经》批评上的一个发展。采诗说奠定了后宋代朱熹一派的风诗出于“里巷歌谣”之说。此说在现代《诗经》学中得到了强化,又与各种现代的诗歌发生说合流,成为现代学者解释《诗经》尤其是风诗的基本学说。

四

汉代诗歌史的建构,虽然由于经典与非经典这一核心意识的横亘,使得整体的诗歌史难以完全建立,但已经开始脱离音乐史的整体,达到相对独立的品格。与先秦儒家主要面对《诗经》一种来建构诗歌史不同,汉代史家所面对的是楚辞、汉代辞赋、乐府这样几种新的对象。所以,如何将先秦时期确立的王道诗学的观念发展到《诗经》之外几种诗歌的史学建构,就是汉代史家诗歌建构的新课题。

司马迁处于武帝时期楚辞学兴盛的背景,对屈原作品做出很高的评价,奠定诗歌史上诗骚并提的基础。比起他在《诗经》方面的评论,他有关楚辞的评论更能体现他在诗歌方面的真知灼见,更具诗歌学的意义。《史记》论楚辞:

> 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离骚者,犹离忧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穷则反本,故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疾痛惨怛,未尝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

① 班固:《汉书》卷三十,第 6 册,第 1708 页。
② 班固:《汉书》卷二十四,第 4 册,第 1123 页。
③ 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卷十一,《十三经注疏》下册,北京:中华书局 1980 年版,第 1328 页。
④ 孔鲋:《孔丛子》卷三《公仪》,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0 年版,“诸子百家丛书”本,第 24 页。
⑤ 何休注:《春秋公羊传》卷十六,《十三经注疏》下册,第 2287 页。

谓兼之矣。上称帝喾,下道齐桓,中述汤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广崇,治乱之条贯,靡不毕见。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汙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

太史公曰: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及见贾生吊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诸侯,何国不容,而自令若是。读《　鸟赋》,同死生,轻去就,又爽然自失矣。①

从这两段评论中可见,司马迁强调《离骚》的抒情性,尤其是“怨”的合理性,“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司马迁从屈原遭遇的困境,即“信而见疑,忠而被谤”来解释《离骚》创作的原因,充分强调诗歌抒情性。同时他也是中国文学理论的历史第一次明确肯定个体抒情的合理性的学者。孔子论诗有兴观群怨之说,第一次将怨作为诗一种本质性功能提出来。孟子与高子之间,也曾经对诗的怨的问题产生过不同的看法。司马迁可以说是孔子“诗可以怨”思想的发展者。并且其对怨的合理性的强调,达到了中国古代美学思想这方面的一个高度。这对中国古代抒情诗学是一个重要的贡献。司马迁对《离骚》的评论,大体取于淮南王刘安的《离骚传》。据此可见汉武时期抒情思想的发达。但更重要的是他概括《楚辞》艺术特点的结果,《九章·惜诵》:“惜诵以致愍兮,发愤以抒情。”司马迁在文学理论方面另一个重要看法,即认为发愤著书之说,影响更大:

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戹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史记·太史公自序》)②

司马迁的发愤之说,正来自《九章·惜诵》“发愤以抒情”,同时又接受了孔子的思想。《史记·孔子世家》载孔子之自叙云:“其为人也,学道不倦,诲人不厌,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③《史记·伯夷列传》说到善恶报应之说不实时也有“发愤”之论:“或择地而蹈之,时然后出言,行不由径,非公正不发愤,而遇祸灾者,不可胜数也。余甚惑焉,傥所谓天道,是邪非邪?”。④ 可见司马迁的发愤,是一种文学正义之论。即正义之士遭遇困境,无所控诉,发之于文学之中。这种思想对文学精神的揭示,比起前人要深刻得多。但他与“言志说”“抒情说”“诗可以怨”之说的一脉相承关系,经过我们这样梳理,正可一目了然。

司马迁上述诗论的卓越之处,还在于他将《离骚》提高到与《国风》《小雅》一样高的地位,并且认为兼有两者之长。“《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这事实上是说《离骚》继承并发展了《国风》《小雅》的艺术。这个思想的开放性是相当突出的,我们知道,在中国古代的文学批评中,对《诗经》是整体肯定的,对于《楚辞》虽然重视它的艺术,但却对其伦理上的雅正价值,一直是有所质疑的。司马迁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比较开放、先锋的文学思想的呢?一般认为是其遭遇促成的,但是我们也看到,比起班固,司马迁更多地继承了两汉大一统之前的思想自由的传统。

与司马迁论定楚辞品格,并从品格方面将其与国风、小雅纳入诗歌史体系不同。班固以比较实证的方法,对《楚辞》在汉代传承历史做了这样的叙述:

始楚贤臣屈原被谗放流,作《离骚》诸赋以自伤悼。后有宋玉、唐勒之属慕而述之,皆以显名。汉兴,高祖王兄子濞于吴,招致天下娱游子弟,枚乘、邹阳、严夫子之徒兴于文、景之际。而淮南王安都寿春,而吴有严助、朱买臣、贵显于朝,故世传《楚

① 司马迁:《史记》第 8 册,卷八十四,第 2482、2530 页。
② 司马迁:《史记》第 10 册,卷一百三十,第 3300 页。
③ 司马迁:《史记》第 6 册,卷四十七,第 1928 页。
④ 司马迁:《史记》第 7 册,卷六十一,第 2125 页。

辞》。①

后来王逸在《楚辞章句·九辩序》中也交代了楚辞名义的由来及其部分历史:

> 宋玉者,屈原弟子也。闵惜其师忠而放逐,故作《九辩》以述其志。至于汉兴,刘向、王褒之徒咸悲其文,依而作词,故号为“楚词”。亦采其以立义焉。②

结合班、王两家之说,《楚辞》的传承历史可以说已经得以比较完整地呈现。

班固对于诗歌史的建构的一个贡献,是关于诗亡而赋作的看法,将辞赋系统与诗歌接续起来,建立了赋出于古诗这样一个诗歌史观点。其《诗赋略》:

> 传曰:“不歌而诵谓之赋,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言感物造耑而材知深美,可与图事,故可以为列大夫也。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以微言相感,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谕其志,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焉。故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也。春秋之后,周道浸坏,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学《诗》之士逸在布衣,而贤人失志之赋作矣。大儒孙卿及楚臣屈原离谗忧国,皆作赋以风,咸有恻隐古诗之义。
>
> 其后宋玉、唐勒;汉兴,枚乘,司马相如,下及扬子云,竞为侈丽闳衍之词,没其风谕之义。是以扬子悔之,曰:“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如孔氏之门人用赋也,则贾谊登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③

《诗赋略》为刘向所著的《七略》的一种,班固将节其要,收入《艺文志》,所以也可以说的刘向、班固两家的思想。上述这段话中追溯赋的源流,将其与春秋时代士大夫的赋诗、引诗制度联系起来,认为诗学是士大夫的一种基本技能,即所谓的“聘问歌咏”。这种诗教作用,造成了士大夫的文学功底,尤其是造成了一批“学诗之士”。这些学诗之士,正是贤人失志之赋的作者来源。这就将文学史中很重要的一个环节梳理出来了。除了这个之外,班固在讨论赋的基本方法时,还提出了“赋者古诗之流”这个看法。这就在作者与文体两方面,都将辞赋与《诗经》联系起来了。

班固《两都赋序》中提出“赋者古诗之流”这个重要看法,与其在《诗赋略》中的观点是一致:

> 或曰:赋者古诗之流也,昔者成康没而颂声寝,王泽竭而诗不作。大汉初定,日不暇给。至于武宣之世,乃崇礼官、考文章,内设金马石渠之署;外兴乐府协律之事。以兴废继绝,润色鸿业。是以众庶悦愉,福应尤盛;白麟、赤雁、芝房、宝鼎之歌,荐于郊庙。神雀、五凤、黄龙、甘露之瑞,以为年纪。故言语侍从之臣,若司马相如、吾丘寿王、东方朔、枚皋、王褒、刘向之属,朝夕论思,日月献纳。而公卿大臣御史大夫倪宽、太常孔臧、太中大夫董仲舒、中正刘德、太子太傅萧望之等,时时间作。或以抒下情而通讽喻,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雍容揄扬,著于后嗣,抑亦雅颂之亚也。故孝成之世,论而录之。盖奏御者千有余篇,然后大汉之文章,炳焉与三代同风。④

班固“昔者成康没而颂声寝,王泽竭而诗不作”是继承了孟子的观点。某种意义上说,孟子关于王泽竭而诗不作,诗亡而春秋作的观点,是最早的一个文学史式的叙述。班固认为赋的兴起,是诗教的余泽,并且在文体的渊源上认为“赋出于古诗”。

辞赋出古诗,是汉人基本的诗史观念。王逸的《楚辞章句》是第一个系统的楚辞评论文本。他强调“《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谕”⑤。即赋出于古诗的具体说法。又其解淮南小山《招隐士》篇时说“八公之徒”:“著作篇章,分造辞赋,以类相从,故或称小山,或称大山。其义犹《诗》有《小雅》《大雅》也。”⑥也是用赋出古诗的理论,为其寻溯渊源。

五

班固梳理诗歌史乃至文学史的一个基本脉

① 班固:《汉书》卷二十六,第 6 册,第 1668 页。
② 王逸注、洪兴祖补注:《楚辞补注》卷八,北京:中华书局 1983 年版,第 182 页。
③ 班固:《汉书》卷三十,第 6 册,第 1756 页。
④ 萧统编、李善注:《文选》上册,北京:中华书局 1977 年版,第 21 页。
⑤ 王逸注、洪兴祖补注:《楚辞补注》卷一,第 3 页。
⑥ 王逸注、洪兴祖补注:《楚辞补注》卷十二,第 232 页。

络,是古诗、辞赋、乐府诗歌。他们认为辞赋出于古诗。因为辞赋是一种文人文学,文人是熟知文献、继承诗书礼乐的,所以讨论辞赋的起源,势不能不追溯渊源到《诗经》。在班固之前,《史记》已经将屈原的《离骚》与《国风》《小雅》联系起来讨论,认为《离骚》是继承《国风》《小雅》的。因为屈原虽是楚国大夫,但楚在当时已经接受中原文化,屈原"博闻彊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①我们拿《左传》中的贤士大夫与屈原相对照着看,发现屈原正是长于行人诗学的春秋战国时代贤士大夫之流。所以班固说"学诗之士,逸在布衣",这个学诗之士的群体,当然也包括屈原在内。② 屈原作《橘颂》《天问》,是四言雅颂体的变化。而其《离骚》与《九歌》《九章》,则是直接使用楚国歌诗之体,加以发展。所以,司马迁与班固,都将屈原作为《诗经》的继承者,而宋玉等人则是屈原的继承者。屈宋则构成辞赋的祖先。但汉人辞赋与楚辞相比,变化很大。所以扬雄又提出"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的看法。这样,整个从《诗经》到两汉的诗歌史的主要观点,就建立起来的。当然,我们后来所建构的文学史,没有完全依照司马迁、班固、扬雄等人的观点来叙述与评论。这里面探讨的空间是很大的。

《汉书·礼乐志》中还记载了汉代乐府及其诗歌的来源:

> 初,高祖既定天下,过沛,与故人父老相乐,醉酒欢哀,作"风起"之诗,令沛中僮儿百二十人习而歌之。至孝惠时,以沛宫为原庙,皆令歌儿习吹以相和,常以百二十人为员。文、景之间,礼官肄业而已。至武帝定郊祀之礼,祠太一于甘泉,就乾位也;祭后土于汾阴,泽中方丘也。乃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作十九章之歌。以正月上辛用事甘泉圜丘,使童男女七十人俱歌,昏祠至明。夜常有神光如流星止集于祠坛,天子自竹宫而望拜,百官侍祠者数百人皆肃然动心焉。③

《汉书·艺文志·诗赋略》:

> 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云。④

班固没有将乐府歌辞提高到足以与《国风》《楚辞》相提并论的位置,这与汉儒整体贬低汉武帝重俗乐的行为是有关系的。《史记》作者处于乐府兴盛之世,却基本上不加叙述。班固从礼乐文化与文献这两个角度注意到乐府及其歌辞,承认其是"感于哀乐,缘事而发",尝试将其纳入儒者推崇的"采诗"体系中,并且强调其有"观风俗、知厚薄"的功用。他的这个理论,也成了后世文人乐府诗歌的重要创作原则。

汉儒建构诗歌史,班固之贡献最大。班固通过《诗经》、楚辞、乐府、辞赋几大类的整理,并且通过采诗、学诗之士失职逸在布衣而赋作,赋出于古诗,以及汉武帝立乐府采诗可以观风俗、知得失等观念的勾连,在他的话语体系中,其实也建立了一个完整的诗歌史。当然这个诗歌史的建构是以强调儒家诗教思想为基本立场的。

小　结

早期诗歌史建构,发源于礼乐文化,依藉于"先王之乐""王道"等基本的观念。至儒家区分风雅正变、孟子提出"王道之迹熄而诗亡",正式确立了儒家一派的诗史建构。汉代经学家、史学家引而申之,并且由《诗经》为对象的单一的经典诗歌史建构,扩大到楚辞、汉赋、乐府这几种重要的诗歌类型中。虽然其中仍然横亘着经典与非经典这一观念局限,妨碍了整体诗歌史的建构,但脱离了对乐史的依附,并且在经典与非经典,辞赋、乐府与《诗经》之间,建构起一种史的联系。可以说,在诗歌史的建构上已经达到很自觉的意识。某种意义上,比之后世文人自身建构诗歌史,史学

---

① 司马迁:《史记》卷八十四,第 2481 页。
② 参看钱志熙《王官诗学行人诗学与诸子诗学》,《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 年第 2 期。
③ 班固:《汉书》第 4 册,卷二十二,第 1045 页。
④ 班固:《汉书》第 6 册,卷三十,第 1756 页。

意识更为自觉。其对古代时期中国诗歌史建构的奠定作用,不容忽略。其方法与具体的结论,对于今天重新建构早期诗歌史,也是必须重新审视与取资的传统学术资源。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Poetic History in Early Times and its Value in Academic History

Qian Zhixi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ancient poetic history is an important foundation for the study of ancient poetic history in the modern form. The construction of poetic history from high antiquity to the Han Dynasty, is an early form of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ancient poetic history. The construction of poetic history started long, long ago, which was originally attached to music history, with "the music of the former monarch" (先王之乐) as its fundamental idea. Mencius' statement that the Book of Songs vanished with the decline of the monarch's ritual and music system (王者之迹熄而《诗》亡), can be considered as the earliest elaboration of poetic history. The Confucians constructed their poetic history principally with The Book of Songs as its main body, but theoretically expanded into the whole poetic history. Some historians of the Han Dynasty like Sima Qian (司马迁) and Ban Gu (班固), constructed the history of

Elegies of Chu (《楚辞》) and Yuefu-poems (乐府) by citing the Confucianist theories of music education (乐教) and poetic education (诗教), and searched for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poem and sao (骚) and between poem and fu (赋), which helped to construct an all-round poetic history. However, when Ban Gu and other historians constructed their poetic history, they still had classics and non-classics intertwined, thus being unable to complete an integral poetic history in the genuine sense.

Key words: construction of poetic history, poetics of the Han Dynasty, Confucian of the Han Dynasty, historian of the Han Dynasty

(责任编辑　郑　园)